

从中国大陆当代古籍整理的现状

- 看其类别、方式方法及走向 -

The present state of process
in the arrangements of historic classical books in China
: According to classification
into various types, methods, styles, and directions

曹亦冰

(中国, 北京大学)

《 Abstract 》

The aim on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the present state and circumstance in the course of arranging historic classical books in China. In order to approach its purpose, it should make it clear to define the word of “The present”(当代). Furthermore, we need to take a deep notice on the arrangements itself of historic classical books, its influences and contributions, reflecting this process carefully with thos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oints of view due to the meaning of “The present”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is considerate view,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determine the accurate time of “The present” to be the period of time from October, 1949 to December, 2003. It can be described very suitably well as “bamboo sprouts grow fast after a rainfall”(雨後春荀). This tremendous works in the arrangements of Classics have gone through sweets and bitters of times during 50 and several years. However, this work in process has overcome so much troubles and exclude obstacles in doing so, gradually begun to bear tasteful fruit of many publications, about 10,000 works so far. Although it has gone far with very little amount of work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emains that would be put in order in the incoming future, it succeed effectively to the spirit and soul in Chinese culture and people. Illuminating the development in its historical steps and analyzing elaborately flows in cultural and ideal elements, it is known that this work of arrangements not only give a very firm basis for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but also extend high level of idea and thoughts in their thoughts so that build up the spirit in socialism on the solid foundation.

This paper will give a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n this works and its contribu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examine and give a good, careful, and close look on the arrangement of historic classical books in China by various means of classifying into various types and style, searching for many methods, and showing indication and directions that might be right in “the present”.

※Key words: the arrangements of historic classical books in China, The present, the spirit in socialism, classifying into various types and style, searching for many methods, showing indication and directions that might be right in “the present”

當代, 古籍整理, 雨後春筍, 語言, 綜合參考

首先说明, “当代”一词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目前这个时代。” 我这里关于当代的定位是1949年10月至2003年12月。

当代的古籍整理的现状是怎么个情况呢? 我觉得, 可以用一句成语形容, 犹如“雨后春笋”。古籍整理事业经过五十余年的风风雨雨,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在广大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披荆斩棘, 获得了丰硕成果, 整理出版了约有一万余种古籍。尽管它只占总存世的古籍数额的极小部分, 但它却是有效地承传了中华民族精神, 弘扬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出了杰出贡献。纵观当代古籍整理的现状, 我想论述三个问题:

I. 当代古籍整理的类别

记得在八十年代初, 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搞了一个3000项“古籍规划项目”汇编本, 分“文学”、“语言”、“综合参考”、“历史”及“哲学”五个类别; 随后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也搞了一个2200余项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自选项目汇编》, 其分类, 与国务院古籍小组的“汇编本”基本一致。后来学者所搞的古籍整理项目尽管没有按照这个“汇编本”进行, 但是其类别却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这就是:

1. 文学类

从整理出版的作品看, 主要有三小类(举例皆为有重大价值、有影响的作品): (1)

诗词文类：已经完成并出版的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如《诗经》、《楚辞注疏长编》(金开诚)、《两汉全书》(已出版2册)(董治安主编)、《司马相如集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邓安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建安七子集》、《陶渊明集校注》(袁行霈)；隋唐五代时期的作品，如《全唐文新编》、《韩愈全集校注》(屈守元)、《李白全集校注》(詹锜)、《全唐五代词》等；宋元时期的作品，如《全宋诗》(孙钦善等)、《全宋词》、《全宋文》(已出版50册)(曾枣庄等)、《全宋笔记》(已出版10册)(朱易安等)、《欧阳修全集》(李逸安)、《苏轼全集校注》、《黄庭坚全集》、《全元文》(已出版25册)(李修生主编)、《关汉卿全集校注》(王季思)等；明清时期的作品，如《全明诗》(已出版2册)(章培恒等主编)、《全明文》、(已出版二册)(魏同贤等主编)、《张居正文集校注》(张舜徽)、《清诗纪事》(钱仲联主编)、《全清词》(顺康卷)(程千帆主编)等；(2)小说类：文言小说，如《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周祖谟)、《搜神记》、《全唐五代小说》(李时人)、《唐语林校证》(周勋初)、《太平广记》(汪绍楹点校)、洪迈《夷坚志》(何卓点校)、《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主编)等；白话小说，如《宋元话本》、“三言”、“二拍”、《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封神演义》、《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等；(3)戏曲类：《全元戏曲》(王季思)、《古本戏曲丛刊》(丛刊编委会)、《全清散曲》(谢伯阳)等。

2. 历史类

如《尚书》、《战国策新校注》(缪文远)、《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国语》、《三国志校笺》(赵振铎等)、《三朝北盟会要》、《华阳国志校注》(刘琳)、《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史通》、《文献通考》、《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典》(王永兴等)、《清史稿》(中华书局)、《大唐西域记》(季羨林等)、《钦定八旗通志》(李洵等)等。

3. 哲学类

如《论语》、《老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周易全解》(金景芳)、《管子校注》、《抱朴子》、《韩非子》、《淮南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十三经注疏》、《朱子全书》(朱杰人、严佐之等)等。

4. 语言文字类

如(影印)《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甲骨刻辞类纂》(姚孝遂)、《两周金文集释》、《许慎与说文解字》(姚孝遂)、《尔雅诂林》、《广雅诂林》(徐复)、《故训汇纂》(宗福邦等)。

5. 综合及其它类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影印)《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影印)《道藏》(上海书店)、《永乐大典》、《中华律令集成》、《本草纲目》(刘衡如等点校)等。

以上所举整理出版的成果,当属精品。因为第一,学术上,这些整理本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第二,内容上,这些整理本高度地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及代代承传的优秀文化。第三,定位上,其中有一大批成果是开创性的,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第四,运作上,整理方式方法符合学术规范,标点精当,校勘严谨。

II. 当代古籍整理运用的方式方法

古籍整理,是从汉代刘向开始的,直到清末及民国年间,历朝历代都有许多专家学者或是奉命或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从事这项工作,而不同朝代的整理古籍又有各自不同的方式方法。他们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创新的一面。我们当代的古籍整理工作,在继往开来的前提下,形成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特点。这就是:

1. 有比较合乎规范的标点与校勘

众所周知,古人著书立说是不搞标点符号的,就连断句也是极少有的事情。大概到了清代中后期出版的一些书籍里面逐渐地出现了用圈(。)表示的断句法。整理古籍使用标点符号,最初是胡适先生倡导的,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就拟定了“整理国故计划”,提出了不可缺少的分段、标点、注释、校勘、导言五项基本工作。接着汪原放就进行了尝试,对《水浒传》进行了标点和分段,反响很好。由此,标点古书就成了学术界一种时尚。然而,标点是五花八门,很不统一。1951年国家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全国推行。这对古籍整理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我们整理古籍的工作,可以说是‘起死人而肉白骨’的工作。这不是说要把历史的僵尸复活,而是要对过去的东西,赋予以新的生命,让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新的历史

时期服务。(北师大白寿彝先生在1983年3月初教育部召开的“贯彻中央关于古籍整理和人才培养指示精神”研讨会上发言)白寿彝先生讲出了当代古籍整理工作的真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文化事业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也进入了新阶段。文字由繁到简,语言表达也彻底告别了“之、乎、者、也”,取而代之的是“吗、啊、呀、的”新语助词和统一的各种新式标点符号。这对于整理古籍也是个新的挑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说:整理古籍“首先是标点。”(《论古籍和古籍整理》198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从五十多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成果看,基本上都使用了符合规范的16种标点符号。其中句号(。)、逗号(,)、顿号(、)、冒号(:)、分号(;)、问号(?)、叹号(!)、单双引号(“”’)、括号(())、间隔号(·)、书名号(《》)、专名号(—)和破折号(——)使用得比较多;而省略号(……)、连接号(——)、着重号(·)及反诘问号(!?),使用得比较少。

古籍整理第一阶段的工作除了标点、分段,还有校勘。校勘第一步是确定底本,一般都是选用内容完整、错误较少、刊刻较精的版本;其次,选择几种校本,一般都是选用祖本或最早的本子,同时还要选择其它有代表性的本子为参校本;再次,在选择好底本、校本和参校本后,进行逐字逐句的校对;再次,对于校勘中出现的问题的处理,采用出校记的方式。从出版的整理成果看,大都是底本正确而它本有错者一般不出校记,而底本有讹、脱、衍、颠倒等错误,基本上是在本文上径直改正,用圆、方括号表示增删之字,并在适当的位置上写出校记。标点较精当,校勘较精审的,如《二十四史》点校本、《全宋诗》、《朱子全书》等。

2. 注释

注释工作,不是当代古籍整理者的新创,早在汉代就有了。比较著名的是郑玄。他遍注五经,他的注释成了后人学习的典范,由此逐渐形成一门学问,这就是注释学。魏晋时期的王弼、唐代的孔颖达、陆德明、宋代的朱熹、清代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都是继郑玄之后著名的注释学家。注释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它不仅要帮助读者看懂古书原文,还要帮助读者了解文外之意。特别是书中的引经据典,如果读者对历史上各种书籍没有熟读,对历史知识也不了解,要想读懂某种古书,哪怕是白话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不借助注释也是件很难的事情。所以说古籍“注释范围包括很广,有历史的事实,有人物的事迹,有古代的地理,有中外的交通道路,有佛经的故事,有词语的解释和文辞上的典故以及名物制度等等,这么多内容都要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文件汇编·周祖谟〈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体会〉》)”注释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如《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羨林)、《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唐语林校证》(周勋初)、《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堃)、《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等)、《三国志校笺》(赵幼文等)等。

3. 辑佚

辑佚(逸),即编辑收录佚书和佚文。李一氓先生在《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中指出:“有些古籍,有书名,有著者,或者还有卷数,或大体上知道是什么(或全不知道),但就是没有这个原书。古人从许多丛书、类书中沙里淘金似的,辑出了不少佚书,对学术贡献很大。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今后还有许多工作好做。(此文收录1983年12月《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文件汇编》内)”鲁迅先生在二十年代搞的《古小说钩沉》就是一部高质量的辑佚性成果,给从事小说方面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当代古籍整理的辑佚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某个方面或某部书为课题进行辑佚,类似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佚出失传很久的《旧五代史》和鲁迅从古代各类书中完成的《古小说钩沉》一样。如2001年、2002年线装书局出版的21种《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古委会主任安平秋等主持),其中有若干种书籍是国内失存已久的,纯属佚书。如宋刊本《崔舍人玉堂类稿》和元刻本《村西集》及元刊本《西翁近稿》,皆国内失存;宋刊本《全芳备祖》,国内多为清抄本;宋刊本《东坡集》和元刊本《史记正义》,此二书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国内藏本中所没有的;元刊本《联灯会要》,国内仅有涵芬楼影印日本编纂的《大日本续藏经·联灯会要》,内容上各有异同。再如2003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季羨林等主编),收录了67种稀见的中国古籍,其中有一批是国内失存的孤本书籍,属于佚书。如明刊本《字考不分卷》(明夏宏)、明刊本《国策三注评林》(明沈一贯辑、李廷机释、叶向高评林)等。其它如陈尚君《全唐诗补编》、韩理洲《全隋文补补》、韩理州《唐高祖文集辑校编年》、李希泌《唐大诏令集补编》、徐勇《先秦兵书艺文辑解》、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刘操南《史记春秋十二诸侯史事辑证》、王树民等《戴名世遗文集》、李增杰《古代六种字书佚文补辑并注》、齐裕焜等《型式言》、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其二,在进行编纂断代诗文总汇中将辑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如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孙钦善等主持的《全宋诗》,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1986年立项的一个重大项目,全体编纂人员历经十二年,于1998年编纂完成,全书72册3785卷,收录作者9079人,得诗247183首、残诗5983句、存目323首(句),3945·40万字。其中辑佚所得的诗约20000余首,仅大家集就达224卷,那些被辑出来的小家诗作数量也是很可观的。其“辑佚的范围是:(甲)目前传世的诗集,(乙)第一批书目集辑所得。所谓第一批书目,主要是:(一)现存宋元诗话、笔记及其他诗集。(二)现存宋元类书、总集,以及《永乐大典》和《诗渊》的残存本。(三)宋元方志,以及近年来集中印行的若干重要方志,如影印天一阁明代方志。(四)《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已引用到的书。(五)敦煌遗书。(六)部分佛藏。但在实际辑佚过程中,所采之书范围较此更广,如大量清代甚至民国时期

的方志就都成为辑佚所采之对象。(此文采自第60期《高校古籍工作通报》漆永祥《简论〈全宋诗〉的编纂与学术价值》)再如1986年在古委会立项的另一重大项目——四川大学古籍所曾枣庄、刘琳主持的《全宋文》，截止1997年基本编纂完成，全书共收约一亿字，收文近二十万篇，全书出齐约一百八十册，是《全唐文》的十倍。“《全宋文》的主要价值在辑佚，全书所收逾万作者中，有文集传世的宋文作者仅数百人，也就是说，95%的宋文作者都是从散见于上万种的图书资料中收集来的，……宋代有文集的早已失传，而《全宋文》收集的佚文竟多达十余卷，如富弼、范镇各有遗文十二卷，李清臣、王岩叟各有遗文十卷，可局部恢复其文集。有的虽有文集传世，但《全宋文》都另辑得数十篇，甚至逾百篇佚文，如杨亿、蔡襄等等。四库馆臣所辑《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自称十得八九，后来孙星衍的《拾遗》竟达二十二卷，我们在两种基本之外又得遗文七十余篇。《全宋文》所辑得的宋代诏令，几乎是《宋大诏令集》的数倍。”(此文采自《高校古籍工作通报》第四十九期曾枣庄、刘琳《〈全宋文〉情况及编纂经验介绍》)

4. 考证辨伪

考证辨伪，是古籍整理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因为古人著书喜欢借用他人之名，或是使用室名别号，或是不署名，所以就出现了一大批伪书和无名氏之书；也有人喜欢编书，特别是雕版印刷业兴盛的时期，在编书过程中缺乏谨严之风，不进行仔细核查，甚至有意增删；还有的有意编改前人之书，张冠李戴，因而出现了一些错书。因此在古籍整理过程中一定要对所整理的古籍进行一番考证辨伪。在这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化》中提出了考核伪书的八种方法，清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十二条辨伪公例。当代古籍整理在考证辨伪工作上更为重视，无论是进行的大型断代诗文总汇，还是对某种书的整理，都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考证辨伪主要是围绕书名、作者、年代、内容、史实、辞汇等方面进行精细严密而准确的核查取证，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如程千帆《古诗考索》、周勋初《九歌新考》、姜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缪文远《战国策考辨》、陶敏《全唐诗人名考》、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北图出版的清人黄丕烈、王国维等《宋版书考录》、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项楚等《敦煌文学丛考》等。

5. 影印

影印古籍，即采用照相拍摄的现代设备技术，对古籍进行复制。原样复制古籍，这

不是现代出现的事物，在古代就已有之。只不过其名不叫影印，而是叫作“影钞”、“影摹”。尽管一字不差地将所要抄写的古书过录下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古籍的原貌，因为原书的字迹、装帧、印刷等通过钞的形式是无法再现的，而影印基本上可以使古书再现原貌。因而它的价值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能够使刊刻年代久远的古籍，如唐写本和宋元刻本的古籍经过影印，可以使它走出收藏它的图书馆与当代的广大世人见面，广大世人能够借助影印观赏到唐宋元明清各个不同朝代刊本的古书原貌，从而可以领略不同朝代的雕版印刷的技术。二是便于专家学者对古籍的学习和研究。三是有利于保护原流传下来的古籍。因为古籍刊刻年代久远，它那粹得如干树叶一样的纸已经不住频繁地翻阅，然而又不能一概拒绝有关专家学者的使用，所以有了影印的古籍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对原书的翻阅，从而可以延长古籍存留的寿命。当代影印出版的古籍，大致有四类：其一，大型的类书、丛书，如《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宋本册府元龟》、《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唐代四大类书》、《古逸丛书三编》等。其二，刊刻年代久远的古籍，如宋元时期的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刊）、《泊如斋重修考古图》（北宋本）、《注坡词》（宋刊）、《营造法式》（北宋本）等。其三，有价值的古籍。如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正在进行的《善本再造工程》；其四，海外收藏的善本、孤本古籍。如古委会运作的《影印日本皇官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广西师大出版社影印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图书馆藏珍本汉籍》、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从海外复制了266种宋元明善本医籍，其中影印出版了数十种，弥补了国内的空白。等等。从影印的古籍成果看，有两大特点：一是影印的本子大都遴选得比较好；二是每部书前均撰写了影印说明，阐述了其版本源流及学术价值。

6. 汇编

当代古籍整理有一类成果，属于汇编性成果，大都是将有价值的资料，按类编辑在一起。如俞平伯等《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杨翼骧《史学史资料编年》、王友三《中国无神论史资料选编》、《李商隐资料汇编》、《一宫三陵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国家图书馆金石组《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明清石刻文献全编》、清华大学图书馆《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东疆文献汇编》、李树田《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李启谦等《孔子资料汇编》、李启谦等《孔子弟子资料汇编》、杨荫楼等《全唐文政治经济资料汇编》、赵蔚芝《稷下学宫资料汇编》、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

资料》、侯忠义等《金瓶梅资料汇编》、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组《中国科技史料选编》(陶器、琉璃、紫砂、农业机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中华书局组稿出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

III. 当代古籍整理的今后走向

手抄笔录整理古籍，具有两千多年的传统了，时至今日，仍然在使用着，然而时代在前进，科学技术在发展，一切事物都将逃脱不了遭淘汰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新事物。这正应上了宋代诗人王安石的一句诗：“总把旧桃换新符”(《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荆公诗注》)。目前，古籍整理工作正处于以新替旧的阶段。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早已关注了古籍整理工作的手段更新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召集十一个古籍研究所的负责人及从事电子计算机工作人员关于“配备微机处理机试点问题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古籍整理工作靠祖宗传下来的手抄笔录已是落后的手段了，不仅“速度缓慢、成本高、耗时多，而且使研究人员的聪明才智难于充分发挥。”(《高校古籍工作通报》第6期)此次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委托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与该校语言自动处理中心合作，利用‘中心’的设备开展研究，委员会提供部分经费；二、选定条件具备的几个古籍研究所首先配备电子计算机，分工进行资料储存、检索和‘人机对话’等方面的研究；三、在条件具备的一个古籍所配置一套缩微复印设备，委员会积极予以资助；四、凡属承担试验研究任务的古籍所，均需由该所所在学校提出申请报告，保证提供实验所必须的房舍、设备、人员。尽快写出方案报告。委员会秘书处审议后与之签订协议书，拨款投资。承担单位经试验后写出报告，包括使用方式、使用效果、配备条件等。在这个基础上，逐步为有关研究所配备机件。”(《高校古籍工作通报》第6期)此后，高校古委会在为促进古籍整理手段现代化，采取了三项有效措施：(一)给古委会直接联系的二十六个教学科研机构配备电脑，为高速信息公路的连网作准备。(二)给上海师大、东北师大两个古籍所各配备一台微处理机，用以试验用微机编制古籍索引和储存古籍的效果；同时配合华东师范大学给其古籍所配置了一套进口缩微设备，试验用缩微设备复制古籍。(三)先后给《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全元文》等大型项目配备电脑若干台，使他们能够尽快使用电脑检索。四川大学古籍所做得比较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居然能够使用电脑对所整理的古籍进行录入、检索、排版，形成了一条龙编纂流水线。为了推进古籍整理手段现代化的进程，古委会秘书处又于1998年在北大召开了专门会议，请各古籍所喜欢并懂得电脑技术人员到会，还邀请了语委、科学院及一些大型软

件研制开发公司的科学技术人员，共同研讨了古籍整理如何使用先进的电脑技术，如何开发软件，如何使用软件文本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次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共同的协议，但是通过会上的交流研讨，互相启发，却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从此，出现了电脑技术人员纷纷涉猎古籍整理领域、古籍整理人员踊跃投入电脑软件开发的景象。在大家自愿组合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运用电脑技术进行古籍整理的科研成果，有人称它是“古籍数据库”，有人称它是“古籍电子语料库”，还有人称它是“中国历代基本典籍库”，也有人称它是“电子版古籍”。总而言之，它为古籍整理工作开拓突破性的新起点。其成果，人文类：如《古今图书集成》、《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全唐诗》、《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集刊》、《丛书集成》、《二十四史订补》、《二十五别史》、《二十五史三编》、《中国野史集成》、《中国野史集成续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普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医书》、《善本戏曲丛刊》、《明清抄本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佛经类，如《中华大藏经》、《佛光大藏经》、《大正藏》（1—55卷、85卷）、《永乐北藏》、《龙藏》、《高丽藏》、《佛光大藏经》等；道藏，如《道藏》、《藏外道书》等（以上信息采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8期楼宇烈《汉文化资料库不同层次的实用要求》）。其中大部分是经过扫描的图像数据版，有一些是电子文本数据，有一些是图像数据与文本数据对应合成的，制作质量比较高，又方便使用的，如书同文公司研制的《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

目前规模最大的电子版古籍，要算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俊文教授主持的《中国基本古籍库》（爱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开发研制），收录了先秦至民国重要典籍一万余种，每一种提供一个通行版本的全文信息，另附1—2个珍贵版本的原文图像，总字数20亿、图像2千页。它拥有强大的检索系统，既可以分类检索，也可以条目检索，还可以全文检索，更可以进入高级检索，能够通览一万种古籍内的书名、卷数、时代、作者、版本、提要等各方面情况，真正可以做到搜集、标点、校勘、注释、编选、撰文及打印在内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全方位的电子化工作方式方法。但是这是个爵士用品，价格昂贵，个人很难购买使用。

从上述电子版的古籍成果看，古籍整理的手段现代化基本上从试验阶段走向成熟阶段，从单一的电子扫描、文本录入到具有检索功能、繁简字体通过超平台可以达到自由的转换，有的书还做到了图像数据与文本数据对应。古籍电子化，是保护和传承古文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整个国际国内文化形势使然。其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两个巨大的又是普遍发展着的动力物在驱动着，一个就是电脑的普及，另一个是网络的覆盖。尽管在目前这两个动力物还处于初起的势头，但是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看，今后它将成为人们事业与生活中

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文化产业中的两个巨大支柱。因此古籍整理工作将会全面地进入电子化运作的阶段。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于2003年提出了古籍整理应建立三个层次的古文献资料库：一是“版本库”。他认为“‘版本库’的功能，从整体上来讲，主要是为了保存和疏通现存的汉文古籍。”其做法，“我们可以通过扫描把这些古籍转换成数码图像，把纸质古籍变成电子图像版本，……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尽可能地把留存至今的全部古籍文献保存下来，不至在为将来某些重要纸质古籍不幸毁坏而感到遗憾。”他鉴于十余万种古籍都要做成电子图像板，工程浩大，因此提出“首先应当建立一个‘珍稀孤本善本库’。这是目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以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5部(经、史、子、集)古籍善本书目为基础，……订出一个统一的规格和要求，然后由各图书馆分头去做。……而这一库的建立，立刻可以把原来只是某图书馆独藏的珍本、孤本、善本，变成全国各图书馆都可以流通借阅的珍本、孤本、善本了。”“其次，建立一个‘域外现存汉文古籍库’。……制作电子图像版本……”“再次，建立一个‘普通古籍库’。尽可能地将现存于世的古籍制作成数据图像，把它保存下来。”

二是“专题库”。“专题库顾名思义就是要按各种专题来制作，如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制作各种专题库；也可以按照现行学科分类，如语言、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经济、政治、法律等制作各种专题库；……也可按照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断代来建专题库；也可以按人物，如朱熹、王夫之等来建专题库；也可按著作，如《周易》、《老子》、《庄子》、《论语》、《孟子》等来建专题库。……在各类各级专题库中，其实按照适用对象及其功能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类是普通专题库，一类是研究专题库。……一般讲，普通专题库所选内容要精当，全部文献都应做成电子文本，外观要简洁朴实，有阅读纸质书的感觉；在应用上，则至少要有能方便地做各种检索的功能。……研究专题库的要求和设计，则应是内容尽可能完备，是研究这一专题的人在这个库中找到他所需要的原典材料、应用和表现方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结合。这里除了普通专题库的内容外，可以加进大量版本库中的原始资料，有些可保留版本库的简单形式，有些则需要配以电子文本，而且还要提供电子文本与原书数码图像页页对应的功能，以便研究者方便地核对原书。”

三是“普及库”。“‘普及库’的功能，从整体上来讲，主要为各层次(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等)一般读者了解和掌握传统文化提供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样的各类最基本的汉文古籍读本。……”(2003年第一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载楼宇烈《汉文化资料库不同层次的实用要求》)

我认为楼宇烈先生关于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三个不同层次的“古文献资料库”的设想，非常好。它既符合飞速发展的电子化时代要求，也具有实际运作的可行性。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古籍整理工作从手抄笔录到全方位地使用现代化的电子科学技术，要有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的期限有多长，至少要有数十年或是上百年。因为第一，

尽管出现了一批精通电脑和网络技术之人，但是在古籍整理界毕竟尚未占主流，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仍没有学习和掌握电脑技术，习惯于使用手工操作；有一些人虽然会简单地用电脑打印文稿，但是要让他们使用电脑去整理和研究古籍，恐怕还有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第二，要将国内外图书馆收藏的纸质古籍全部变成电子版古籍，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特别是通过网络让全世界人使用，更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这里面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个观念和权力问题。第三，电脑和网络的普及面的问题。电子版古籍是给有文化人使用的，估计现在拥有电脑和能上网的文化(中等文化)人约占总有人群千万分之一。要想达到百分之百有文化人都能拥有电脑和能上网，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主要的是个经济问题。因为纸质一本书，可以供许许多多的人借阅使用。电脑和网络就不同了，凡是使用它都需要有一定的资金作保证。由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在这个过渡期内，古籍整理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将会逐步成为主流的手段，这是不可置疑的；而电子版古籍与纸本古籍将会同时出现并存。

《参考文献》

- 邱德修、〈從上博 容成氏 簡揭開大禹治水之謎〉、簡帛研究網站、2003。
- 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網主、〈上海藏簡第四冊內容簡介〉、簡帛研究網站、2004。
- 駢宇騫、〈銀雀山竹簡《王兵》篇初探〉、《古籍整理與研究》七、1992。
- 晏昌貴、〈上博簡《容成氏》九州束釋〉、簡帛研究網站、2003。
- 任繼愈、〈莊子探源—從唯物主義的莊周到唯心主義的“後期莊學”〉、《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1。
- 張恒壽、《莊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 朱淵清、〈禹畫九州論〉、簡帛研究網站、2003。
- 陳劍、〈上博簡《容成氏》的拼合與編連問題〉、簡帛研究網站、2003。
-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齊國法律考析〉、《史學集刊》、1984。
- 吳九龍釋、《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
- 關鋒、〈莊子《外雜篇》初探〉、《哲學研究》、1961。